

文津出版

文史哲大系一六四

水滸意境的探索

水滸
忠義
考證

傅正玲◎著

第十三届全国书市样书

文史哲大系
傅正玲著 164

悲壯與蒼涼

水滸意境的探索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悲壯與蒼涼：水滸意境的探索 / 傅正玲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2001[~~164~~]
面 ; 公分. -- (文史哲大系 ; 164)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68-660-1(平裝)

1. 水滸傳 - 評論

857.46

90015860

文 史 哲 大 系 (164)

悲 壯 與 蒼 涼

——水滸意境的探索

著作者：傅 正 玲

發行者：邱 家 敬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106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E-mail : twenchin@ms16.hinet.net

電話：(02)23636464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820號

初版：2001年11月一刷

印數：1000本

ISBN : 957-668-660-1

新台幣 200 元

序 言

文學作品是透過具體的生命情境來顯照人性幽光，和哲學直接言說人性不同，人性具有普遍性，直說人性乃形於抽象式的語言，從真實流動的生命過程中抽繹出來，易流於偏枯把捉的局面，而文學不離具體人生的觀照，是在具體的時空中，透顯普遍的人性，人性的反應無不植於特殊的環境遭遇中，因此，可以流傳百世的文學作品，正是這特殊環境與普遍人性的一體觀照，人存活在不同的時空處境，隨時與所處環境往來對應，人性就像時時閃爍發用的光芒，貫穿成人類的生命歷程。只是，哲學直接呈現人性的本質，而落在具體時空中的人性反應，則與環境相綢繆，有了或明或暗，歡笑歌哭的各種人性面貌，閱讀這些繽紛的人性色彩，如何在不同的時空中獲得共鳴，並對人性的普遍性有一體照，對特殊時代中的文化處境有一省思，都是閱讀者的功課了。

水滸故事從南宋以說書形式傳衍開來，元代在水滸戲中持續生發，到了明代長篇章回小說的構作出現，故事又在水滸傳的各種版本中伸縮增減，編者、評批者與閱讀者都不斷地將閱讀感知反應在水滸的故事原型中，於是一百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等各種版本如百花齊放，到了明末清初，金聖歎所出的七十回本水滸傳收結了版本的變化，到了民國初年學者對古典小說進行另一種角度的研究，於是各種版本又出現在讀者面前，一百二十回本與七十回本的水滸傳成為今日讀者最常見到的作品，不限定於一個情節固定的版本，這也成了閱讀水滸的特殊樂趣。

水滸故事在漫長的時空中流行，緣於故事原型反應了人性的普遍性，而這普遍性又植於人文社會的某種一致性，長久以來，

人類社會一直存在人文理性與原始氣性之間的張力，水滸故事呈顯這永恆的主題，乃使不同時空中的讀者不斷地與之發生共鳴，並投射出不同時代處境中的不同渴求，於是水滸的故事原型在不同時代中有不同的形式發展。

對這樣一部古典小說進行研究，就不僅只是創作形式的賞析與評價，而是嘗試掌握住水滸故事的精神意蘊，探索當中所顯示的人性處境，並透過這人性處境的關照，省思每個時代的文化特質。

明代興起的小說評點，評批者主要還是以閱讀過程中被興發的感受為主，呼應字句，即興式的發抒看法，但因為時代思惟、文化氛圍及評者個人情性的不同，使同樣一個故事，出現不同的評批角度，主要的水滸評本有容與堂出的百回本，掛李卓吾名，袁無涯出的一百二十回本，也是署名李卓吾所評，還有貫華堂出的金批七十回本，容本與袁本的評者問題，仍難有定論，而金聖歎以其閱讀感受直接反應到腰斬水滸的作為，認為七十回本，水滸收束於梁山聚義才是原著本意，也引起今日學術研究斷其優劣的爭議。以今日日本諸客觀性的學術角度，來對被安置在「小道」脈流的古典小說進行考證，恐怕常易限入自說自話的研究結論，中國傳統小說一向在民間生發，故事的傳衍流變有其寬鬆自然的天地，因而，一部長篇小說，很難斷定其創作者，一個流行的故事，或增或減，似乎大家都有參與「傳」「說」的資格，因而，與其去考究一個作者，或者去追究最早定本，不如去接受小說的傳衍特質，觀照一個故事在不同時代、不同版本、不同評者、作者間，所傳達出來的時代思惟與文化訊息。

從傳統即興式的文學欣賞，到今日的學術研究，一部作品被觀看的角度已有極大的變異，傳統文人與文化環境相依存，一吐

一納，都是文化的生發，金聖歎的七十回本《金批水滸傳》，很自然地取代一百二十回本，流傳在民間。然而，今日的學術研究則自成一個專業領域，所有的思考與言說，自成學術性命題，其與現存文化的互動，即便不能說是掛離，但也只能算是文化脈流中少有影響力的一支。

尤其民初五四以後，中國傳統的學問，都因西潮的衝擊下，在救亡圖存的危迫感中展開，取西方研究方法對中國傳統進行整理，幾乎是學術主調，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全面的衝激交融成一複雜面貌時，學者對中國古典學問進行學術研究的主題，仍是如何現代化的思考？民初胡適將探討科學的實證精神帶入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考證之風興起；王國維則透過更為普遍性的美學角度，來發抉古典小說的精神意蘊；魯迅從版本的收集分析，建立小說史的流變觀念。到六〇年代，夏志清等所掀起的新批評，主張回歸作品本身、文學本位來對文本進行研究，於是一股強調美感形式、文學結構技巧的風潮；但以西方文學角度來分析中國傳統作品，當中所出現的框套問題，也成為這一波風潮中被反省的課題，於是在中西文學比較參照下，中國文學的獨特性也被強調出來，建立中國文學的美質性，以之恰當地開發古典作品的意蘊與風格，成為另一個學術研究的方向，本書的研究路向即循此開展，在中西悲劇意識的對比參照中，透過水滸美感的觀察，意圖開發中國文化特質中的悲劇文學風貌。

西方的文學研究，已從現代跨入後現代，新批評中將文學作品掛離讀者文化情境的客體性對待，被詮釋學學派提出批評與反省，詮釋學主張人文學不同於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是一統於普遍的律則，以普遍的律則來化約具體事物，人文學則是從具體的存在事物中，透顯其普遍性，任何一部文學作品必然與其文化傳統、

存在情境血脉相繫，因而，當今的讀者去閱讀古典作品，也不可能掛離自身的具存處境，反因根源於自身具存處境，從不同時空中與作品交會，而能發掘出新的意蘊，中國傳統小說在當前時代的生機，似乎是應從這樣的研究角度出發。

步入後現代的思潮，中國的學術研究，不應該還局限在如何現代化的課題中，更不該是跟隨著西化的腳步裡，一兩百年來中西方文化的全面交流，中國傳統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對照下，被全面性的反省與探究，也逐步突顯其相異而又互補的文化特質，在中國學術的主體性逐漸清晰確立後，也應是其參與人類文化發展，且發用其特質的時刻。

悲壯與蒼涼—水滸意境的探索

目 錄

序言	(1)
第一章 探索古典小說的研究方法.....	1
一、現代文化情境裡的古典文學研究	1
二、民初古典小說的研究路線	3
三、新批評與比較文學的研究發展	14
四、結語	18
第二章 悲劇理論在中國文學中的研究	23
一、悲劇理論在民初的研究	23
二、「中國沒有悲劇」的爭議	28
三、比較文學中的悲劇研究	33
四、中國悲劇意識的探討	38
五、結語	44
第三章 水滸故事與版本的傳衍流變	45
一、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傳衍特質	45
二、史實與話本間的流轉	48
三、元雜劇中的水滸故事	52
四、明代的版本問題與故事發展	55
五、《水滸傳》作者與金聖嘆截本	59

第四章 水滸故事與時代思惟的呼應關係	65
一、小說與世情的傳統關係	65
二、水滸精神的萌發與南宋時風	68
三、元朝水滸戲與異族統治的文人處境	72
四、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與明代社會	76
五、金聖嘆截本與明末清初的思潮	80
第五章 明代《忠義水滸傳》的評本研究	85
一、幾部《水滸傳》評本的考據問題	85
二、性靈文學思潮與小說理論的發展	90
三、明代評本所呈現的水滸精神	95
四、小說美感的掘發	104
第六章 金聖嘆七十回本《水滸傳》評本研究	111
一、七十回截本爭議	111
二、金聖嘆評點的水滸精神	117
三、金聖嘆論《水滸傳》的結構之美	121
四、金聖嘆評水滸人物之美	127
五、結語	133
第七章 《水滸傳》一百二十回本與七十回本的 結構精神比較	135
一、傳統小說結構的研究角度	135
二、一百回本與一百二十回本結構上的比較	139
三、一百二十回本與七十回本結構上的比較	144
四、兩種生命觀照的角度	147

第八章 一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的悲劇意識 探究	151
一、從結局的悲劇性說起	151
二、從叛離體制到回歸體制	157
三、從殉於體制彰顯忠義精神	164
四、儒家義下的悲劇意識	168
第九章 七十回本《水滸傳》悲劇意識探究	173
一、從七十回本的結局說起	173
二、無曲的生命意興	176
三、興的筆法	183
四、道家義下的悲劇意識	190
參考書目	193

附 錄

一、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 探究兩種悲劇類型	203
二、紅樓夢的研究路向探究－談王國維的 「紅樓夢評論」	225

第一章

探尋古典小說的研究方法

一、現代文化情境裡的古典文學研究

古典與現代的區隔，並不是直線時間上的先後分別，事實上在當前具體的時空中，所謂的古典作品都持續在各種情境中釋放其意義，雖然在形式上，其發生在文化脈流中過去的某一點，但能跨越時空對不同文化處境的人發生有形或無形的影響，常是在其形式的背後具有某種可以橫跨時空的永恆性。也就是這樣的「永恆性」，使古典文學在現代文化中具有了被觀照與被研究的價值。透過專注的觀照與研究，我們不僅能契近人類精神中的某種「永恆性」，從而更對特殊時空中的個體存在有所確定，也能因對古典作品的了解，更清晰於當前所處的文化情境，並因之探尋到開向未來的腳步。⁽¹⁾

相對於現代一詞而來定義古典，一個較為表象的區隔，是從文化脈流的歷程性來看，文化是變動性的，在變動的趨勢中，每個時代有相應其文化情境所產生的文學作品，古典作品有其特殊

⁽¹⁾ 西方詮釋學的觀點即建立在典籍與讀者間所擁有「一個意義共體」，狄爾泰〔Dilthey〕認為「這是一個精神去把握另一個精神的過程，一個人在他之中重新發現他自己。」翁文嫻在〈接近那創作的契機—中國現代詮釋學初探〉一文中，對此有一證說：「傑出的文藝作品，並不在於表現作者，而在於表現人類共有的生命本身，……因此，文藝的詮釋行為，有相當大的客觀精神，因為雙方都需回到共同的生命實體之中」而所謂文化的開展，即是每個具體時空彰顯了永恆的精神。引文見《創作的契機》一書，〔臺北，唐山，1998〕，頁104。

的文化條件，而此文化條件已不成為當代的主流，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現代文學作品與古典文學作品便有一隔閡，現代人即便刻意以古典的文學形式從事創作，因為難以讓現代人對之產生親切感，也勢必要邊緣化。雖然古典作品仍被當代人閱讀，持續釋放其意義，但由於文化形勢的不同，現代人對它的閱讀，已失去了共同文化背景裡才可能有的一種自然產生的感應能力。⁽²⁾但相對而言，現代人對古典作品的閱讀，也可能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發掘出另一種意蘊，而使得古典作品的價值更新地透顯出來。現代的古典文學研究者，是在這因不同的文化條件所產生的隔閡，一則開展出現代人進入古典作品的恰當途徑，使古典作品不致因文化背景疏離化而被棄絕，更重要的，是在關切與對應當代的文化處境上，發掘出古典作品中的義蘊，以滋養當代人的生命存在。⁽³⁾而只有在古典作品與當前文化處境相融合的狀態中，意識到古典作品作用於當前，才是當代詮釋者真正理解了古典作品。換句話說，每個時代對古典作品的詮釋歷程，正是其文化發展的歷程。

⁽²⁾ 葉嘉瑩先生曾談及現代人對中國古典作品常發生誤解，乃是由於詮釋的人缺乏了與作者相同的薰習修養，而此薰習修養，對相同的文化情境的作者、讀者及詮釋者而言，是理所當然的。因「他們之間所具有的共同的閱讀背景，共同的表達習慣，共同的思惟方式，共同的感受聯想，以及由此多種因素所結合而成的一種共同的欣賞與判斷能力。」見《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一書，[臺北，桂冠出版社，1992]，頁157。

⁽³⁾ 西方哲學詮釋學的學者高達美即強調對傳統的理解只有經過實踐應用，理解才算是完成，他說：「詮釋者在處理傳統文獻時，總要應用到他自身上。但這並不意謂著對他來說文獻是普遍的，他理解到此普遍性後再予以應用。而是，詮釋者要的就是去理解此文獻—普遍之物；亦即，去理解此傳統之文獻說些什麼，構成此文獻的意義與重要性為何。為了理解那文獻，他不得忽略他自己與他的特定詮釋處境。如果他想要有真正的理解，他就必須將文獻關連到其處境。」ans-Georg Gadamer 的論點見〈詮釋與創造—傳統中華文化及其未來發展〉一文，林鎮國先生對高達美思想的介紹，文見《詮釋與創造》沈清松編，[臺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5]，頁429。

現代人閱讀古典作品，時空相異的存在背景，成為閱讀與詮釋上必然要被思考的條件，這樣的「相異性」，導使現代人與古典作品之間產生距離，但也在相異處境中開啟契應點而發生新的意義，這種因古今差異所產生的張力，使古典作品與當代處境發生遭遇與對話的歷程，而這歷程便促進了一個時代的向前發展。民初以來，對中國古典小說的觀察與研究，就因這「相異性」而發展出各種不同的樣態，在這些樣態錯綜複雜的交織與互動中，出現多元化的詮釋角度，也使得古典作品的面目不斷變異著，也許，我們要思考的不是比較那一種詮釋角度較正確，而是，那一種詮釋角度能切應當前文化處境，使古典作品釋放出豐富的意蘊，即是說，那一種詮釋角度較可能使古典作品再活一次。^[4]

二、民初古典小說的研究路線

在中國漫長的文化流程中，每一個時代都有重新詮釋古典作品的狀況，但是卻未曾出現如當代這樣全面性地去反省整個傳統內涵；而自從中華民族形成統一的文化載體後，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衝撞與融合，本就是整體民族往前發展的重要因素^[5]，但

^[4]「使古典作品再活一次」不僅是古典作品的意義與價值的彰顯，同時是，對當前的文化處境的滋養與開創，對當代研究中國傳統學問的學者而言，曾因西化的衝擊而產生救亡圖存的焦慮感，乃有「如何使傳統現代化」的研究路向，用現代西方的學術觀點與方法重新包裝古典作品，不僅不能使古典作品「活化」，反使之在現代學術格局中被「古董化」，古典作品本就存在於現代生活中，應該的走向是如何釋放古典作品的意涵，以參與、對應當代的文化處境。

^[5]閻國忠先生在〈傳統文化、外來文化與現代化〉一文中，討論到三者的互動性，他說：「傳統文化恰恰是在與非傳統文化的比較中存在和發展的，任何國家或民族如果沒有對非傳統文化的借鏡、吸收或推拒，就不可能保有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而任何一種文化的消亡或滅絕都有一個原因，就是把自己封閉起來，與外來文化完全隔離。」文章引自《詮釋與創造》一書，頁252。

未曾如當代這樣在接遇的當口引發國族存亡的憂懼感。民初的文化環境，是中國與西方相碰撞而產生巨變的時期，由於中西文化的異質性，馬上就在知識份子的救國意識中產生「舊與新」、「落後與進步」的截然劃分，在追求現代化的腳步中，認定要以改造傳統為途徑，在文化處境上導致傳統與現代的斷裂，而在古典學術的研究上，出現了「以西方為典範」及「以西方的研究方法來整理國故」的意識。民初以來對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幾乎是不出離這樣的主調。

首先，掀開扉頁的是梁啟超，梁啟超本身對古典小說並無涉足研究，但卻呼應晚清風潮提出許多新觀念，啟發了後來的學術研究。胡適曾在〈四十自述〉中提到在學術上他受了梁啟超「無窮的恩惠」，是讓他「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⁶⁾ 在晚清時期，即使是譯介西方思想、文學進入中國的嚴復、林紓等人，都是以中國文化為主體，對西方文化進行吸收，但這樣的吸收對危迫的時局無寧太過悠緩，梁啟超提出「新民說」，主張「淬礪其所本有而新之」，「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一則對傳統文化進行檢討反省，二者對西方文化進行採補，這都是更新文化必行的道路，但在〈新民說〉中，他又更進一步以進化論來解釋白人是最優勝之民族，取西方文明為座標來更新傳統文化，遂成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⁷⁾ 梁啟超以此維新觀念的背景對中國小說進行批判與開新，他大力主張小說的教化意涵，覺得要改造社會政治，小說是最佳的工具，認為「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歷，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

⁽⁶⁾ 〈四十自述〉，《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72]。

⁽⁷⁾ 〈新民說〉，文見《飲冰室文集》，[臺南，大東書局，1967]。

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義、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8]對比地反省中國社會政治，舊小說的影響薰染，是造成腐敗的總根源。他說：「今我國民，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啟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所以，「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9]民初的現代小說創作的形式與精神，即順此觀念興起，傳統小說乃被指稱為「舊小說」，梁啟超以特定的政治關切角度，認為小說應為開創國族新的未來服務，遂對中國古典小說產生否定的言論。他說：「中土小說，雖列之於九流，然自虞初以來，佳制蓋鮮，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10]梁啟超乃至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在「進步」的迫切感中，常藉著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所產生的心理張力，促動國族向西方學習的更新改造，遂出現對古典小說偏見式的論斷。在這些獨斷性的否定言論中，「汰舊換新」成為時勢所趨，傳統文化快速地在現代化的腳步裡流失，當代人也對傳統產生了疏離感，在疏離感中重新面對古典文化，幾乎預告了中國古典文學在時代的推移中，已迅速進入一個必需被全面地重新詮釋的時期。

梁啟超雖然否定了古典小說的價值，但他從小說的影響功能大力提高小說的地位，卻也促成中國一向不重視小說的傳統改異，小說的創作風氣大興，而小說的研究也受到了重視。梁啟超個人在小說研究方法上的開啟，主要亦是沿著小說具有薰、浸、刺、提四種影響社會力量的觀念展開，由於小說的價值被定位在

^[8] 〈譯印政治小說序〉，《飲冰室文集》。

^[9]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飲冰室文集》。

^[10] 同註 7。

社會功能上，所以小說中所蘊藏的思想，及其思想在社會倫理意涵中的意義，成為探討一部小說作品的重要角度。⁽¹¹⁾以這樣的角度對古典小說進行探討，是近代以來頗被遵循的一種研究路線。

梁啟超指中國古典小說「不出誨盜誨淫」兩端，主要是呼應他的時代對政治社會改造之迫切感，欲造新小說以應時代所需，而提出的一種論斷。循此發展，到了胡適便有所謂「全盤西化」的運動。但事實上，梁啟超一直沒有棄絕傳統文化的觀點，尤其他在一九二〇年歐遊回國，也意識到中國傳統思惟能補足西方近代科學理性所產生的危機，他在〈為創辦文化學院事求助於國中同志〉的文告中提出：

啟超確信中國歷史在人類文化中有絕大意義，其資料之豐，世界罕匹，實亘古未聞之無盡寶藏，今日已到不容烏鵲之時代，而開採之需用極大勞費。⁽¹²⁾

但這現代處境下的「無盡藏」該如何開採出來，似乎對處在一心要邁向現代化之趨勢裡的中國人而言，是更形困難的問題。

⁽¹³⁾

⁽¹¹⁾ 柯慶明先生將梁啟超的觀點納入中國文學批評的體系中，認為他近於言志傳統。另外他也指出梁啟超對近代文藝思潮的影響：「中國近文藝思潮中，不論口號如何迭起，主張如何更易，有一始終不衰的潮流，就是一種視文學，特別是小說，為教化民眾，改革社會，甚至政治鬥爭之宣傳工具的影響說的文學態度。」梁啟超或可以說是將言志傳統以現代專題論文體式轉化出來的一種批評路徑。引文見《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7〕，頁8。

⁽¹²⁾ 〈為創辦文化學院事求助於國中同志〉，《飲冰室文集》。

⁽¹³⁾ 西方近世紀以來從科學理性到工具理性，以物我相對的認知型態，發展出人類控制與操縱的行為趨勢，在兩次世界大戰後，現代化的危機引發了許多思想家對西方理性文明的反省，存在主義乃至後現代思潮紛紛興起，東方的思想乃物我相融的感知型態，對應現代化的危機，其具消解釋放的意義乃彰顯出來，可惜，民國以來以去傳統做為追求現代化的手段，使得傳統思想無法參與到現代化的時代課題中。

在清末民初「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背景中，主張吸取西方的研究方法來整理中國文化，也成了許多人努力的方向。但在吸取的過程中，中西文化如何互動？中國文化如何不是被扭曲而是被透顯？都是在這過程中不斷被思考的問題。在傳統小說的研究領域裡對此思考最深且對後世最具啟發性的先導者，即是王國維先生。面對西潮襲來，中西文化的對比中，王國維首先體認到中國文化所顯現的限制與不足，在〈論新學與之輸入〉一文中，他認為西方的抽象思辯文化，正可參照出中國重實踐具體的特質：

國民之性質各有所長，其思想所造之處各異，……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於抽象而精於分類…吾國人之所長寧在於實踐之方面，而於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為滿足，至於分類之事，則除迫於實際之需要外殆不欲窮究之也。……故我中國有辯論而無名學，有文學而無文法，足以見抽象與分類二者皆我國人之所不長。⁽¹⁴⁾

面對外來文化，參照出傳統文化的特質與不足，在文化的發展上是難得的契機，王國維從歷史上舉出佛教東傳對中國學術的影響，認為自宋以後，思想漸趨於停滯，西洋思想的引入，會將傳統文化中的限制與弊病揭開來，而這樣的揭開與克服，正是使得中國文化本身的生機萌發起來。相較於梁啟超的「報章文化性格」⁽¹⁵⁾，王國維深入歷史文化的意識，使他在面對中國的現代處

⁽¹⁴⁾ 〈論新學與之輸入〉《王觀堂先生全集》，[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68]。

⁽¹⁵⁾ 清末民初之際，梁啟超主辦時務報、新民叢報…等報章，對當時知識份子的影響巨大，楊義先生形容他的生命性格與報章文體特質相乘，認為：「報章那種駭雜而廣博、開闊而易隨時潮變動的性格也就成了梁啟